

赵梦桃与父亲的不解之缘



父亲在西北国棉一厂蹲点采访时,与厂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合影留念。(第二排左八为父亲)

2017年12月上旬,陕西省第十三届妇女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。大会期间,我在主席团的座位,与一位名叫何菲的年轻女子比邻。翻阅参加大会的代表名册,看到这位年轻女子的身份,是咸阳纺织集团赵梦桃小组的第十三任组长。瞬间,一种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
这种亲切的感觉,源于赵梦桃这个名字。赵梦桃这个名字,与我的原生家庭,尤其是与我的父亲,有着源远流长的不解之缘。

上个世纪50年代,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父亲,跟随中宣部副部长张仲实到陕西挂职。在陕期间,张仲实任西北局宣传部部长一年多之后,张仲实挂职工作结束,准备带着父亲一起回北京。临行时,西北局的领导同志对父亲表示,希望父亲能够留在陕西,为我国西北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、推广、普及事业作出贡献。

父亲是四川西部沱江岸边一户贫寒农家的孩子。1944年,父亲带着单薄盘缠,扒在绿色的邮车顶部,辗转千里,历经艰辛,由川经黔入滇,到昆明报考并就读于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所

组建的战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,抗战结束后随校复员到北京大学。新中国成立后,因为品学兼优,被组织派遭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。

作为一个农村寒门学子,能够在首都北京的国家机关,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,是父亲梦寐以求的心愿。但是,面对西北局领导的指示,面对组织上的呼唤,父亲却没有丝毫的犹豫,十分欣喜地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,满怀热情地来到新的工作岗位。父亲留在了陕西,在西安开枝散叶,成家立业。

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一年,父亲有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。当时,在陕西省委宣传部工作的父亲,正在咸阳国棉一厂细纱车间蹲点,吃、住、生活都在厂区,深入班组,对刚刚因肺癌病逝的党的好女儿、优秀纺织女工赵梦桃的事迹,进行采访、挖掘、整理、书写,深刻体会,感悟梳理,凝练并总结感人肺腑的“梦桃精神”。

一个星期六的早晨,母亲带着五六岁的我,从西安到咸阳去看望父亲。记得当时正值盛夏,母亲和我一大早就从西安建国路出发,先乘公共汽车到西郊,又从西郊坐上开往咸阳市区的长途客车,到咸阳之后,再换乘公交车,最后到达西北国棉一厂。

夏日炎炎,一路上热风阵阵,尘土飞扬,终于到了目的地,向厂门口的传达室通报后,母亲和我就近坐下歇息。时隔不久,一群人从厂里走出,他们过来亲切地抱起我说,不久前,父亲从这个池塘中,救起过一个不慎落水的孩子,特来表示感

■钩沉

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堪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之一,解读、研究它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,但其中有个别细节却引起足够的重视,细细品读,会发现其中的奇特之处。比如,小说中出现过一段外星人的故事,当它被翻拍成电视剧后,也一度引起观众哗然。

在《平凡的世界》第三十六章中,孙少平因过度思念晓霞,竟然出现了幻觉:“他渐渐看清,灯光中有个像圆盘一样的物体,外表呈金属质灰色,周围有些舷窗,被一排固定不变的橙色光照亮;下端尚有三四个黄灯。圆盘直径有十米左右,上半部向上凸起,下半部则比较扁平。”

接下来,便是孙少平偶遇“外星人”的奇怪桥段,甚至还出现了“这个人突然开口说话了,而且是一口标准的北京普通话”这样的内容。孙少平与“外星人”的对话,也是在讨论什么地球文明、外星文明的事情,甚至路遥还借“外星人”之口这样说:“你可能不知道,美国一位专门研究超自然现象的专家赖特·史德加博士,就写过一本《奇异的失踪》的书,收集了不少集体失踪事件,所牵涉的人数,由最少十二人到最多四千人……”

我查找了许多资料,始终没有找到这位“赖特·史德加”是何许人也,即便考虑到翻译方法的变化因素,也找不到这个美国作家的任何信息。考虑到过去不少“外国xx专家说xx”都属于国人臆造的假材料,所谓的“研究”也属于伪科学,不排除路遥从某些杂志文章上看到了这个细节,然后便拿来使用的可能性。

到了这段情节最后,还是回到了思念晓霞的层面:“假如他真的经历了所谓的‘第三类接触’,那么他就又一次看见了晓霞,和她重逢了。这已使他感情上获得了很大的安慰。即便是个梦,也很好。能在梦中和亲爱的人相逢,也是幸运的;他早就盼望能做这样的梦。”

路遥为什么要在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里,加入这种脑洞大开的奇特情节?要解释这个问题,还要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图景中去。对当时的读书人而言,外星人恐怕并不只是茶余饭后猎奇的对象,而是象征着科学与现代性的某种特殊表达。改革开放初期,“科学的春天”在全国遍地开花,一部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都能席卷大江南北,让无数知识分子喟然慨叹。与此同时,一些传播神秘的“未知科学”的读物,也在民间广泛传播,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《飞碟探索》杂志。

很难想象,如今已经停刊的《飞碟探索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享有盛名——这是一份存在于1981年至2018年间的“神秘科学”杂志,专注于各种未解之谜尤其是外星人的“研究”,对刺激读者想象力大有裨益,但也因部分内容缺乏实证而被人诟病为“伪科学”。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路遥读过这本杂志,但它引起的全民热议UFO、关心外星人故事的热潮,却通过大众传媒方式,在不同程度上刺激着读书人的脑洞。路遥能写出外星人的情节,可见他确实接触过相关信息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,在不少读书人眼中,“外星人=未来科学=发达文明=现代化=城市化”形成了一个想象的逻辑闭环,尤其是对当时视野不开阔、科学素养有限的农村作家而言,想象外星人就意味着对科学与现代化的追求。哪怕它是非科学的,甚至是荒诞不经的,但在当时近乎狂热的文化热潮中,它不会给人突兀之感。很多在今天看来经不起推敲的著作、学说,在当时都一度甚嚣尘上,尤其是那些宏大的概念与理论,格外容易受到知识分子的追求。

对一个长期被文化压抑的群体来说,严重的知识饥渴症,在很多年轻人身上都有体现。人们太渴望以最短的时间、最快的速度,来弥补失去的岁月。因此,很多似乎可以囊括一切的概念,可以助人指点江山的思想,都成为当时的“文化快餐”。

这种炽烈的状态维持了整整十年,到了路遥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创作《平凡的世界》时,知识界对未知科学与宏大理论的狂热状态达到了巅峰,尽管他当时身处陕西一隅,也并非完全与世隔绝。通过报纸、杂志、广播,路遥对遥远的未知世界充满了兴趣,如同高加林、孙少平他们渴望走出农村一样。但未知的世界也充满着神秘感,路遥只能通过想象“科学”与“未来”,来完成自己知识结构的完善。

如果从专业学习的角度看,在信息匮乏的年代,这种认知难免是局限的,是不准确的,但当路遥下意识地将这种理念融入《平凡的世界》中时,就会出现“想象外星人”的奇特情节。实际上,这反映出当时的读书人对世界认知的局限性,但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,折射的是一个特殊时段的文化图景的真实状况。

奇特细节中的时代文化图景

《平凡的世界》中的「外星人」

■往事

如今,敬爱的父亲已往生,每当想起他老人家,我便会回忆起他在西北国棉一厂蹲点前后的点滴往事;想起他和我的母亲,带着尊重的神情,向我一字字讲述赵梦桃故事的情景。

■语林指瑕

古时的天干地支纪年法,至今仍在用,现在农历的年份仍用此法。譬如2019年,属于农历己亥年便是。

干支纪年,是依干支对应相配而成。天干十位: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。地支十二位: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。顺次以天干配地支,即用单数的天干和单数的地支相配,双数的天干和双数的地支相配。依次是:甲子、乙丑、丙寅、丁卯……循环往复。因其最小公倍数是六十,故而总共配成六十组,用来纪年,亦可纪月纪日。所以六十年称曰花甲。后也指六十岁为花甲。

说到这里,顺便提一下“六甲”。古时称妇女有孕为“身怀六甲”,当然也是从干支纪日法而来,六甲指甲子、甲寅、甲辰、甲午、甲申、甲戌。古人认为妇人在这六个日子最易受孕,故称孕为“身怀六甲”。

干支纪年法的六十组纪年号,都是固定的,不可乱用。《咬文嚼字》月刊载有王翰和王理《拉郎配的“甲辛年”》一文,就谈到了乱用干支纪年法的实例。2006年2月28日,《羊城晚报》有则关于曹雪芹墓石的报道。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红学会副会长蔡义江。蔡先生认

为墓石是假的:“曹雪芹死于甲辛年,不可能是壬午年死的……”,但干支纪年法里并没有什么两个天干的纪年法。况且甲与辛,一个列于第一位,一个列于第八位,不能胡乱扯在一起。曹雪芹卒于公元1763或1764年,即癸未年或甲申年。蔡先生为宁波人,“申”发音几乎同“辛”,想来他说的“甲申年”,而记者听成了“甲辛年”。方言误听情有可原,但“甲辛”拉郎配显然反映出知识结构的缺陷。

有没有光说天干的纪年情况呢?《全唐诗》卷七〇六黄滔卷收有其《王癸岁书情》一诗,内容是对大军阀李茂贞和朱全忠恣意横行和唐室风雨飘摇的感慨。此处的王癸,指昭宗景福元年(892)和景福二年(893),岁值壬子和癸丑,为方便计,黄滔便简作了“王癸岁”。《全唐诗》中有些诗以干支年号作为诗题,但以天干二字作诗题的仅此一首。

干支纪年法有几个字,容易被写错,典型者则有:“戊”与“戌”的混用,“戌”字错写成“戊”,还有“乙”“己”“巳”的混用乱搭配和错写,还不明白地加上了“巳”。如果我没有记错,黄河壶口的牌楼匾上,大概就写了“甲戌年”,影印本《资治通鉴》中,写“己”为“巳”,将天干写成地支之字也绝非个别。我在为某出版社编辑书画集中,见某书家在书作后题款时,几处将表

示年份的“乙丑”写作“乙醜”,这是弄错了同音字。“丑”作为地支之属,古已有之,而“醜”是丑陋的醜。作为简化字“醜”成了“丑”,但还原成繁体,“醜”与“丑”则无涉。故以《史记》例,将其“乙醜”处理为“乙(醜)[丑]”。

在此再说一下干支纪年的算法。天干算法:公元年数减三,再除以十,所得余数就是天干所对应的数字序。若余数为零,此数字则对应天干最后一位“癸”。地支算法:公元年数减三,再除以十二,所得余数即为地支所对应的数字序。余数为零,则对应地支最后一位“亥”。

例如:1911年的干支纪年天干的计算方法是:(1911-3)÷10,余数为8,8所对应的就是处在天干第八位的“辛”。该年地支的计算方法是:(1911-3)÷12,余数为“0”,“0”所对应的就是“亥”。据此可知1911年是辛亥年,即猪年。也就是我国推翻帝制,建立共和那一年。

例如,2013年干支纪年天干的计算方法是:(2013-3)÷10,余数为“0”,“0”所对应的就是“癸”。该年地支计算方法是:(2013-3)÷12,余数为6,6所对应的就是“巳”。所以2013就是癸巳年,即蛇年。

运用此纪年法需要注意的是,正月初一是在公历本年元月下旬或二月上旬;腊月的除夕却是跨公历年度的,不可混淆。

关于干支纪年的赘语

董时进:超越时代的农学天才

一般来说,人与时代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:一种是顺应,或者说叫识时务;一种是冲突,甚至对抗;还有一种是超越。第一种人往往是时代的弄潮儿,世人眼中的成功者。第二种人注定是悲剧性的,其中以读书人居多,比如万世师表的孔子。至于第三种人,那是少之又少,简直是凤毛麟角,比如尼采那样的哲学家。正是基于此,我们才说有些人是照远不照远,有些人是照远不照远,还有一些人是死后才出生。以上这点小小感悟是我一个人的命运际中悟出的。这个人就是董时进。今天已很少有人知道董时进这个名字了,不要说一般的普通民众,就是那些以读书为职业的学问家也不见得知晓。历

史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屏蔽掉一些东西。那么,今天就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,去还原一个真实的董时进。

董时进(1900—1984年),四川省垫江县(现属重庆市)人。1900年农历10月18日,董时进出生于四川省垫江县武安乡天星桥一农民家庭。父母望子成龙,一直鼓励董时进追求学业。董时进于辛亥革命前入桂溪高等小学堂读书,后到重庆上学,继而考入上海南洋公学(即上海工业专门学校,今交通大学前身),毕业后奔工字农,于1917年考入北平京师大农学院,从此与农业结下终生之缘。1920年,大学毕业后董时进考入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美国,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学。1924年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被选为美国施玛玛农学会荣誉会员,后又在伦敦大学做学术研究,在欧洲各国考察一年。1925年,董时进学成回国。历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、主任,国立北京

大学、燕京大学、交通大学、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教授。

董时进终其一生与“农”结下不解之缘。他为农师,任农官,办农刊,立农会,建农党,创农场,著书立说必称“农”。董时进认为,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,国家之兴盛,必须以农立国,科教兴农。他以兴农为己任,终身不渝,即使后来在美国定居,仍念念不忘中国的农业振兴。董时进一生出版了多本专著,如《农业经济学》《农民与国家》《国防与农业》《农村合作社》《粮食与人口》《农人日记》等。他主张推广良种,兴修水利,放干冬水田,提高复种指数,推广美国式农场,实现机械化。董时进为农业可谓是不遗余力、殚精竭虑。董时进关于农业的很多思想和论断,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。

董时进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农学家,同时他还创作小说。据熊培云先生统计,董时进

在海外一共出版了五部小说:《两户人家》《宋林远征记》《破口怒潮》《阿宝救牛记》《赤狱记》。这些小说大多围绕二十世纪中国的乡村生活展开,所涉及的主题包括革命、父子冲突、寻找家园、复仇等。

如果仅仅如此,董时进充其只是一个本分的知识分子,很难赢得世人的推崇和敬重。董时进青年时十分崇敬孙中山,凡有称孙中山为“孙大炮”者,必与之激烈争辩,不折服对方,决不罢休。1919年“五四运动”时,董时进曾上街游行并被北洋军阀拘捕、囚禁,七天后释放。董时进曾猛烈地抨击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。

1949年12月,董时进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公开信,标题是《董时进上毛主席书》,自费铅印,四处散发,提出“江南无封建”论,不赞成在江南进行土地改革。1949年以后,在老一代知识分子中,人们比较熟悉的是梁漱溟和马寅初等先生,但与他



们比起来,真正能在大问题上看出轻重的还是董时进。

董时进晚年奔走于海峡两岸,积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。1984年,董时进因患肠癌,病逝于美国,享年84岁。

■人物春秋